

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

張維玲**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摘 要

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封禪」與「太平」理想不可分割。根據隋唐君主的封禪經驗，統一全國、無重大外患、無嚴重災荒或祥瑞降臨是君臣們認為靠著自身努力可以達成太平的幾個條件。在此政治文化基礎上，本文擬通過「致太平以封禪」探討北宋太宗(939-997)、真宗(968-1022)君臣「走出五代」的歷史過程，並進一步討論他們如何「看待」自身與太平理想的距離，以及用什麼「方法」企圖達至太平。

筆者認為：在「端拱」元年以前，太宗期望以武力收復燕雲來完成一統大業，積極追求太平。在此之後，接受趙普「修德來遠」之論，積極於內政，對外改採消極態度。一方面幫助太宗掩飾軍事力量不足的屈辱，另一方面則為在軍事上無能為力的文臣，找到影響朝政的論調。在此過程中，太宗數次找尋封禪時機，都因不符太平條件不得不放棄。真宗咸平年間，西、北外敵入侵，藉由強調自己無德，以積極應對的方式達成和平。依此，將大中祥符元年的封禪，放在宋初以來的政治文化中加以理解，實為「宣稱」太平已致，使真宗擺脫短命王朝的陰影。

關鍵詞：宋太宗，宋真宗，太平，封禪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第二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2011 年 4 月 20 日）。本文的寫作，業師梁庚堯教授給予特別多的意見和鼓勵，劉靜貞、柳立言、方震華教授也都曾給予諸多寶貴意見，深表感謝。亦感謝《清華學報》二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給予的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信箱：d98123001@ntu.edu.tw

一、前言

學界對宋真宗一朝政局的討論，多集中在澶淵之盟與東封西祀，且兩者之間有近乎因果式的關聯：澶淵之盟約定宋與契丹互稱南北朝，違反了過往統一帝國「天無二日」的理想秩序，於是王欽若（962-1025）以「城下之盟」批評和約，引起真宗的恥辱感。為了雪恥，證明自己是那唯一受上天肯定的天子，真宗乃有封禪泰山、西祀汾陰的舉動。相較於漢唐帝國鼎盛期皆曾使重要外患臣服，宋朝則未能達此成就，澶淵之盟帶給宋朝屈辱感，應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化解此屈辱的方法為何要是「封禪」而非其他？封禪固然為宣示趙宋是唯一受天命的帝國，但沒有外交屈辱問題的前代君主如唐高宗（626-683）與唐玄宗（685-762），為何也要舉行封禪？¹ 單以澶淵之盟給趙宋君臣造成的心理衝擊來解釋封禪的發生，是否小看了封禪在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意義？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離開了汴京，一路向東奔馳，到東嶽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回到汴京後幾個月，一日，真宗召來宰相王旦（957-1017），先和他一同至龍圖閣觀看道教聖像，接著又一起到崇和殿看四百餘種「瑞物」。其間君臣對話所透露出的訊息，顯示了封禪對趙宋王朝的意義：

上曰：「國家符命彰灼，蓋祖宗積德所致。至於寰海混同，干戈不用，成封禪之禮，有由然也。朕每念前代，雖有德之君，能行封禪者蓋寡，朕乃克行，此蓋由雍熙中嘗有經度，制度已備，朕何力之有！」旦曰：「非陛下勵精善繼，力致太平，則不能奉承先志。今又歸美祖宗，實宗社無疆之休也。」²

首先，真宗和王旦都認為封禪是太宗朝欲行而未行的聖典，封禪的舉行對真宗而言，可說是繼承了太宗的遺志；³ 其二，真宗之所以能完成父志，是因為「寰海混

¹ 唐代的封禪，參見汪海，《漢唐封禪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第3章，〈唐代的封禪〉，頁34-41。

² 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丙寅，頁1607。

³ 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6，頁62。當中也稱真宗封禪是「繼述先志」。

同，干戈不用」即統一與和平，這又是真宗努力追求「太平」的成果；其三，真宗說過去的有德之君也未必能行封禪，其實是婉轉地肯定自己亦有「德」。這段對話深刻地呈現封禪對趙宋王朝的意義，封禪恐怕不是澶淵之盟後才「想到」要舉行的儀式，而是太宗朝早就欲行的典禮，「封禪」之所以非行不可，正在於能讓趙宋肯定自我已走向「太平」的理想狀態。

眾所周知，宋代是承繼五代「亂世」而來，要如何才能不成為「第六代」，是北宋開國之初君臣就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有鑑於五代各朝多覆亡於第二、三代君主，對於太宗和真宗而言，他們最後的成績是走向敗亂還是穩定，決定了他們是否能擺脫短命的陰影。⁴ 於是，傳統中國「太平」這象徵穩定與康樂的話語，便成為趙宋君臣常掛在口中，並渴望努力以致的境地。宋太宗便「銳意太平」，⁵ 他以「太平興國」為第一個年號絕非平白無故。⁶ 然而，學者已論及太宗末年充滿危機，⁷ 距離「太平」還很遠，於是「太平」成為繼體之主——真宗，無可逃避的責任。真宗剛即位，直集賢院田錫（940-1003）上書便稱：「陛下方欲求至理、致太平」。⁸ 咸平二年（999），知虢州謝泌（950-1012）上疏也稱：「臣竊謂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耳。」⁹ 另有一次，真宗日送還是翰林學士的王旦奏事離去時說：「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¹⁰ 可以看出，對太宗和真宗而言，「太平」的理想是他們費盡心血想要達成的目標。

⁴ 許多討論北宋前期政治的論著皆提及宋朝的危機意識，如鄧小南認為：「太宗所體現出來的憂患意識，似乎比他的兄長更為強烈。如果考慮到五代時期往往於第二、三代帝王時改朝易代的背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277。

⁵ 田錫，《咸平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2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1前附錄，〈田司徒墓誌銘〉，頁4b。

⁶ 太宗即位兩個多月後，於開寶九年（976）十二月改元，該時距離元旦明明才十二天，太宗卻等不及，急著改元，其中原因蔣復璁認為既非五代舊制，也不太可能是太宗弑兄的心理，反而較同意朱熹認為「一時人才粗疎」的說法。蔣復璁，〈宋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考〉，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頁167-170。而透過本文對太宗渴望太平的文獻記載，或許急著改元「太平興國」，即與太宗追求太平有關。

⁷ 張其凡，〈雍熙北征到澶淵之盟〉，《史學月刊》，1（開封：1988），頁25-30。

⁸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至道三年七月，頁874。原書點校者並未將「求至理」和「致太平」斷開，但筆者認為斷開會較為清楚。

⁹ 同前引，卷44，咸平二年四月，頁942。

¹⁰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第1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前集，卷2，〈王旦〉，頁14。

「太平」固然為趙宋君臣所渴望，但如何找到有說服力的方式來肯定太平已致？從傳統的思想文化中尋求資源，是他們最容易做出的選擇，也是最容易說服人我的方式。本文首先說明「太平」與「封禪」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論述，簡言之「太平」必須靠「封禪」來確認；其次，進一步追問如何能夠達到太平？亦即，太宗與真宗君臣認為要如何操作，才能帶領王朝走向太平的理想境地？因此，本文的目的絕非在判別宋初何時已太平或何時又否，更非評估趙宋君臣口中的太平是否為「事實」；而是欲探討「太平」作為宋初君臣的理想，他們如何「看待」政治現況與太平的距離，又如何加以應對。他們的想法和說法，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實際作為，但其中亦不乏言不符實之論；而其實際作為是否被認為有效或可行，又會反過來影響他們謀求太平的方向與論述。

本文標題「致太平以封禪」，意為達到太平而得以封禪，這是傳統政治文化中對「太平」與「封禪」通常的理解方式。然又可看作「以封禪致太平」的倒裝句，特別當太宗和真宗在謀取太平的過程中遭遇挫折而感到恥辱，使他們達至的太平成就不如理想中完美，舉行封禪反成為「宣稱」太平的方式。因此，本文與既有的雪恥說可謂相輔相成。總之，透過檢視太宗、真宗君臣如何謀求「致太平以封禪」，事實上即是探討宋初君臣面對「走出五代」的時代課題之過程，並一窺在面臨不斷變化的內外局勢下，君、臣如何站在各自的立場，提出不同的應變對策。

二、傳統政治文化中「致太平」與「封禪」的聯結

在探討宋初君臣如何操作「太平」課題前，本節首先追溯傳統政治思想中，「太平」與「封禪」的文化聯結。封禪並非專屬於宋代，想要理解宋朝為何舉行封禪，自然必須追溯封禪的政治意義。並且，「太平」是人們常掛在口中，用以表示一理想境地的詞彙，似乎很難具體指出在哪些條件下可被認為太平，但當「太平」與「封禪」聯結時，「太平」的實質內容就變得較為明確。因此，透過探討傳統文化中「封禪」前須具備哪些條件可稱「太平」，能幫助我們理解趙宋君臣在致太平的過程中，有哪些成就是他們渴望達成的。

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925-996）等編寫《太平御覽》，於八年（983）編成。據說太宗一天看三卷，一年便看完。¹¹ 其中一卷便是

¹¹ 宋敏求撰，誠剛點校，《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46。

〈封禪〉，記載封禪的意義與歷代君王的封禪事蹟。當中引班固《白虎通》：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¹²

又引《五經通義》：

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也。¹³

可見封禪的前提有二，一為改朝換代，二為新成立的王朝達到「太平」，目的則在於告「天」本朝已達到太平的成就。反過來說，當王朝成立，可能達到太平亦可能未太平，而唯有達致太平者，是受到「天」之「命」，能夠繼續安穩地統治天下。

太平興國七年（982），太宗又要李昉編《文苑英華》，纂輯歷代文人文集之精要，於雍熙三年（986）編成。其中收錄唐代崔融（653-706）上給武則天（624-705）的〈請封中岳表〉，提及「致太平，必封禪。」¹⁴又收錄唐玄宗時，張說（667-730）上〈大唐封禪壇頌〉，稱：「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¹⁵可以想見，武則天革唐命建立周朝，自然有必要宣示自己確得天命；而唐又革武周之命，以致唐玄宗也有必要舉行封禪，來肯定唐朝再次受天命。而他們又都將封禪之得以舉行歸因為王朝已「致太平」。¹⁶

以上引《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是因這兩部類書是宋初君臣對傳統文化遺產的總結，但不意味在類書編成前趙宋君臣就對相關內容全無了解，畢竟類書引

¹² 李昉等編，夏劍欽等點校，《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卷 536，〈禮儀十五·封禪〉，頁 252。原點校者未將「必升封太山」與「何」斷開，但筆者認為兩者斷開較符合原意。

¹³ 同前引，頁 244-245。此條引文的標點出自筆者，認為較符合史料原意，故未從原書點校者的標點。

¹⁴ 崔融，〈為朝集使于思言等請封中岳表〉，收入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600，頁 3116-1。

¹⁵ 張說，〈大唐封禪壇頌〉，收入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773，頁 4070-2。

¹⁶ 杜佑《通典》中關於封禪的記載，開宗明義指出：「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也可見「太平」與「封禪」確是相連的文化遺產。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54，〈禮典·吉禮十三·封禪〉，頁 1507。

用的就是文化傳統中的經典與文章。

「致太平以封禪」的概念無疑被宋朝所繼承，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 (947-1004) 就曾說：「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¹⁷ 可以想見，在宋以前的五代都短命而終，這表示他們都未能獲得上天肯定。封禪儀式既是向天告謝王朝已走向安樂穩定，對於身為第二、三代君主的宋太宗、真宗而言，自然有無比吸引力，而成為他們援引以面對「走出五代」之課題的方法。

既然太平之後才可封禪，那麼如何能算太平？以下主要從宋朝之前的統一王朝——隋、唐的封禪經驗，歸納在哪些條件滿足下，王朝可以宣稱太平。

其一，王朝需被認為是統一的。《隋書》記載「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¹⁸ 而隋朝人在肯定自身已致太平時，如何來報神功呢？議請封禪是他們提出的答案。就史籍所見，隋朝湧現一股請求隋文帝 (541-604) 封禪的浪潮。¹⁹ 中國歷代舉行封禪的帝王，皆是統一王朝下的君主；²⁰ 分裂時代有多個不同政權，自然無法肯定自己受到天命。

其二，需外無戰事。隋代學者劉炫 (546-613) 便以「干戈既戢，夷狄來賓」來形容隋代的太平景象。²¹ 唐太宗 (599-649) 貞觀六年 (632)，群臣請封禪的理由之一是「平突厥」。²² 唐高宗調露元年 (679) 欲封禪嵩山，即因突厥二部反叛而詔停。²³ 史稱高宗封禪泰山後，武后請封嵩山，但「每下詔草儀注，即歲饑、邊事警急而止。」²⁴

其三，需內有豐收、無大規模天災。唐太宗貞觀六年，群臣請封禪的理由之二為「年穀屢登」，然而太宗決定封禪的當年卻發生水災，於是暫停了封禪事宜。²⁵ 貞觀二十一年，又欲封禪，但再度因「河北大水」而停止進行。唐高宗麟德二年

¹⁷ 朱弁，《曲洧舊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4a-4b。

¹⁸ 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66，〈房彥謙〉，頁 1566。

¹⁹ 傅揚，《從喪亂到太平——隋朝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73-85。

²⁰ 中國歷史上只有六位皇帝舉行過完整的封禪禮：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汪海，《漢唐封禪比較研究》，頁 15-41。

²¹ 劉炫，《春秋左傳述義》，收入王謨輯，《漢魏遺書鈔》第 3 集，《經翼四集》（板橋：藝文印書館，1970），頁 22b-23b。

²²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23，〈禮儀三·封禪〉，頁 881。

²³ 同前引，卷 5，〈高宗下〉，頁 105。

²⁴ 同前引，頁 111。

²⁵ 同前引，卷 23，〈禮儀三·封禪〉，頁 881-882。

(665) 封禪當年「大稔，米斗五錢」。²⁶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 (725) 舉行封禪，「時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²⁷ 皆可見封禪當年的農業收成，足以影響封禪的興廢。

其四，需有祥瑞降臨，而不能有不祥之天象。前述李沆所謂「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實有傳統文化之依據。《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記載齊桓公 (?-643 B.C.) 欲行封禪，管仲 (725 B.C.-645 B.C.) 勸阻齊桓公的理由是他沒有獲得「鳳凰麒麟」和「嘉穀」等祥瑞。²⁸ 封禪既是一祭天儀式，因此站在傳統文化的角度，上天若承認該王朝確有得行封禪的條件，便會降下祥瑞來表示肯定。²⁹ 唐玄宗下詔封禪，便宣稱如今「和氣氤氲，淳風澹泊。……奇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極瑞，朝夕於林籙。」³⁰ 相反地，若有象徵不祥的天文星象出現，便會動搖君主封禪的信心。如貞觀十五年 (641)，唐太宗原想舉行封禪，但因彗星出現而未逮，太宗因此「避正殿以思咎」。³¹

以上四點，除了統一的條件可能以王朝高強的武力達成外，其他三點似乎都無法操之在我。³² 故而，當統一王朝外無戰事、內有豐收，加上祥瑞降臨時，便被認為是「天命己為王」，是由於「天」對自己的肯定，才讓這些條件一一滿足。從此立場來看，外患消除和境內豐收，也可視為天降祥瑞。可以想見，帝國君主是如

²⁶ 同前引，卷 4，〈高宗上〉，頁 87。

²⁷ 同前引，卷 8，〈玄宗上〉，頁 189。

²⁸ 李昉等編，夏劍欽等點校，《太平御覽》，卷 536，〈禮儀十五·封禪〉，頁 245。

²⁹ 但祥瑞在歷史的進程中反覆地被運用，其真實性早已遭受質疑。唐太宗說：「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瑞。瑞在得賢，白鵲子何益於事？」劉昫，《舊唐書》，卷 37，〈五行志〉，頁 1368。又如後唐長興二年 (931)，泰源發生地震，左補闕李詳上疏也稱：「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41，〈五行志〉，頁 1884。陳弱水提及對祥瑞觀念的批評，是八、九世紀之交古文派文人關心的重點，詳參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頁 385。封禪須有祥瑞肯定的歷史遺產，與歷代對祥瑞的批判態度，是兩種難以相容的想法，但它們皆影響到宋太宗、真宗的封禪活動，詳後文。

³⁰ 劉昫，《舊唐書》，卷 23，〈禮儀三·封禪〉，頁 892。唐高宗封禪後「詔名封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同前引，頁 888。

³¹ 同前引，卷 3，〈太宗下〉，頁 52-53。中國傳統在天人感應的思想下，天文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參見張家鳳、黃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清華學報》，20.2（新竹：1990），頁 361-378；亦以篇名〈漢成帝與丞相翟方進死亡之謎〉收入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22。而有關彗星的政治文化意義，可參考朱文鑫，《天文考古錄》（長沙：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 59-80。

³² 即使是「統一」，也不能說完全可靠王朝單方面的努力，而必須建立在敵弱我強的前提上，理論上我方實力可能操之在我，但敵人的強弱卻無法由我決定。

何心懷畏懼地注視著上天的種種暗示，當君主意圖封禪，而各種瑞象又都滿足時，便證明了「天」對自己的肯定，得以進行封禪大典，向天告謝自己就是那受天命的太平天子了。

然而，王朝是否已致太平，雖然要由「天」降瑞象來加以認可，但既然太平是可以「致」的，則在傳統君臣的政治思維中，透過君臣的不斷努力，便可以影響天，以得到天的肯定。³³ 前述唐太宗在彗星出現停封禪後，就「避正殿以思咎」，這反映太宗認為是由於自己的過錯，才使彗星出現；相反地，若自己是有德有能的君主，上天自然會降下祥瑞。因此，君主「避正殿」後，時常採取罷役、賑恤、親自錄囚等措施，³⁴ 以求挽回天心。趙宋君臣也秉持著類似想法。宋太宗於雍熙元年（984）試圖封禪，當年在一場雷雨後正殿發生火災，驚恐萬分的宋太宗下詔求言：

詔曰：……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朕躬，恐畏震驚，不遑寧處，上天警戒，必有由然。豈非刑賞之有愆？措置之未當？或近習之屏蔽，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³⁵

可見太宗認為必定是自己在施政上有所缺失，才會天降災禍。宋真宗咸平二年臣僚謝泌上書談論太平，更清楚說明了「天」與「人」的關係：

陛下自臨大寶，不加兵於戎狄，使西北肅然，加以風雨時序，民安土著，則太平之象，復何遠矣！至于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之風，開直言之路，斯皆致太平之術，實見行其八九矣，又豈讓唐開元之治也。³⁶

³³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第6版），頁396-398。

³⁴ 如「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劉昫，《舊唐書》，卷3，〈太宗下〉，頁50；「夏四月……壬寅，以旱，避正殿，減膳，親錄繫囚，遣使分省天下冤獄，詔文武官極言得失。」同前引，卷4，〈高宗上〉，頁72。

³⁵ 田錫，《咸平集》，卷1，〈上太宗應詔論火災〉，頁1a-1b。

³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4，咸平二年四月，頁942。

所謂太平之「象」，即是內外皆安；而讓此「象」顯露的是致太平之「術」，此「術」包含各層面的施政。可以說，對帝國君主而言，是否太平看似操之在天，實則操之在君臣施政的良窳。

總之，討論新受命王朝的「封禪」活動，不應離開他們對「太平」的渴求，因為在傳統政治文化的脈絡中，兩者具有因果性的關聯：王朝致太平後，才能夠封禪。若天認為該王朝在施政上的表現已達太平，便會讓外患不侵、風調雨順、百穀豐收、祥瑞紛陳；如此，帝王便得知自己確受上天肯定，於是舉行封禪，告謝天本朝已成功致太平了。儘管對宋代君臣而言，「太平」與「封禪」的聯結受傳統思維的制約，但不意味著趙宋君臣喪失了能動性。當太平之「象」要靠太平之「術」來獲取，如何在實際政治中積極有為，並反過來藉由內外局勢所透露的「天象」進行自我認知，便成為我們觀察屬於宋初君臣走出五代的政治過程。

三、宋太宗前期的致太平以封禪

以下將討論宋太宗、真宗君臣在「致太平以封禪」的政治文化框架中進行了哪些論述，有哪些行動，以此考察他們應對「走出五代」之時代命題的政治過程。細部而言，將探討他們面對不同的政治環境，是否認為自己已致太平？若未太平又還缺少什麼條件？為了達成太平，實際上又進行了哪些努力？他們的言論和做法之間若有落差，背後的意義為何？若趙宋君臣「自認」或「宣稱」已達太平，是否確實滿足所有的太平條件？本節先討論太宗前期。

至少在宋太祖（927-976）末年，「太平」已是皇帝清楚指明的目標。太祖開寶八年（975）平定南唐，由於南唐在受攻伐的過程中極力抵抗，後主李煜（937-978）到了汴京，感到憂懼不已，太祖安慰他說：「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³⁷ 太祖一方面說出「致太平」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指明，他所認為的「太平」首要前提是「恢復疆土」。「太平」作為政治目標於此時被提出，並不令人意外，因將南方相對富強的南唐收入版圖，使宋朝在更大的程度上統一了中國，距離「太平」已不那麼遙遠。不久，群臣請上尊號「一統太平」，但太祖並不接受，理由是「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³⁸ 可見統一北漢與燕雲在

³⁷ 同前引，卷 17，開寶九年正月辛未，頁 361。

³⁸ 同前引，開寶九年二月己亥，頁 364。

太祖的太平事業之中。太祖曾於開寶元年、二年攻北漢未得，去世前又命伐北漢，³⁹足見兼併北漢是統一的必要條件。至於燕雲，有學者認為主要是看重其軍事地理上的重要性。⁴⁰或許可以認為，太祖雖想將北漢、燕雲都收入版圖，但兩者對宋朝的意義還是有輕重緩急之不同。無論如何，統一既然尚未完成，當然不能宣稱太平。

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心目中的太平雖尚未達成，但「致太平以封禪」的企圖，可能已在他心中萌發。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以哀弟身分為太祖寫的〈太祖謚冊〉提到：

然乃無為而治，讓德於天。四登園壇，告類上帝。神功聖德，冠絕古今。方修檢玉之儀，遽趣上仙之駕。⁴¹

「檢玉」的「玉」即「玉牒」，是封禪告天的文書。⁴²這段文字先述太祖四次南郊祭天，緊接著便提及太祖修「檢玉」之禮；而南郊祭天本即有宣示政權合法性的意味，⁴³因此就語脈而言，可以較為肯定此處的「檢玉」是封禪的代名詞。太祖

³⁹ 同前引，卷 9，開寶元年九月，頁 208；卷 10，開寶二年正月，頁 216-218；卷 17，開寶九年八月，頁 374。

⁴⁰ 李華瑞指出宋初談統一策略，多未包含燕雲，雖不能說宋初置燕雲於不顧，但若說太祖君臣的南北統一戰略包括兵取燕雲也缺乏事實基礎；太祖所以念念不忘燕雲，主要看重其地形勢。李華瑞，《宋史論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關於宋初先南後北統一方針討論中的幾個問題〉，頁 53-68。

⁴¹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9，〈帝統九·謚冊·太祖謚冊〉，頁 38。

⁴² 以下幾條可看出「檢玉」為封禪之意：「孫嚴《宋書》曰：袁淑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座，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李昉等編，夏竦等點校，《太平御覽》，卷 536，〈禮儀十五·封禪〉，頁 250；「升中盛禮，增高益厚，登封檢玉，時邁合周詩。」徐松輯，陳援庵等編，《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樂八·鼓吹導引樂歌·真宗封禪四首〉，頁 8；「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田錫，《咸平集》，卷 1 前附錄，〈田司徒墓誌銘〉，頁 2b；「玉牒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8，〈祝文七〉，頁 1a。《太平御覽》也敘述了唐玄宗欲封禪泰山刻玉牒的過程：「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李昉等編，夏竦等點校，《太平御覽》，卷 536，〈禮儀十五·封禪〉，頁 252。

⁴³ 五代初的君主即已嘗試用南郊祭天來宣示政權具合法性。參見 Cheng-hua Fang, "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5 (2005), pp. 63-78.

對「太平」與「封禪」的連繫恐怕也不陌生，在將「太平」視為政治目標下，令朝臣修撰封禪相關禮儀，實不令人意外。可能打算將來完成一統，並達到太平的各種條件後便封禪泰山。⁴⁴ 然而開寶九年（976）十月，還在修禮初期，太祖便過世，「一統太平」便留待太宗來完成。

本文開頭提及，太宗雍熙年間（984-987）已經營過封禪，然而，封禪的企圖可能自太宗即位初期已是政治目標。宋初頗具聲名的諫臣田錫⁴⁵ 因有文集留存，其請求封禪的事蹟得以被保留。透過他的請求，可讓我們一窺太平興國年間群臣請封禪之一斑。以下略述。田錫是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太平興國二年，田錫考上進士前曾獻上〈太平頌并序〉，稱：

聖朝垂統十有八載，皇帝以仁賢之德，由晉邸而即大位，嗣王業而承廟祧，天地氣和，日月貞明，協千齡之會昌，應萬民之推戴。……封禪之禮，歷數十世而無覩焉。天其命陛下修闕典、秩無文哉？……欲願陛下親羣后於東國，展嚴禋於岱宗。⁴⁶

此「太平」之頌的目的即是請求「封禪」，對於未復之燕晉則絲毫不提。⁴⁷ 在省試考題〈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田錫也頗恭維性地回答：「今皇上嗣位而致昇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王之闕政皆修，……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泰嶽」，⁴⁸ 透露封禪是皇帝的期望。此時宋代科舉尚未發展出彌封、謄錄之法，該年田錫高中

⁴⁴ 宰相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6，開寶八年二月甲子，頁 335。可見太祖將豐收視為上天的垂祐，並期望進一步振舉闕政，以致太平。太祖很可能也熟悉太平與封禪的文化內涵。

⁴⁵ 有關田錫其人與其政治際遇，可參考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

⁴⁶ 田錫，《咸平集》，卷 21，〈太平頌并序〉，頁 6a-14b。

⁴⁷ 「皇家創業垂二十年，平楚取蜀，係吳破越，復三代之王畧，消羣凶之厲階，正朔遠頒，恩信大布，外域爭輸於貢奉，云亭方俟於登封。然念三晉遺黎未霑皇澤，一方鉅盜猶保孤城，世宗興問罪之師，大勳弗集，先帝有平凶之志，聖策未伸。……願畫蕩平之策，勿陳游誕之辭。」同前引，卷 22，〈試同人策二〉，頁 3b-4a。所謂「云亭」即云云、亭亭二山的合稱，相傳曾是古帝王封禪之處。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8，〈封禪書〉，頁 1361。故而這道策題是說：以宋朝目前的成就，應該可以進行封禪大典了，但北漢仍未攻下，因此還未能舉行。可見田錫並非不了解封禪與戰事存有矛盾，況且，收復晉地乃太祖遺志，若不能完成，也無法宣稱統一。

⁴⁸ 田錫，《咸平集》，卷 9，〈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頁 4b。

進士第二人，顯示請求封禪的舉動應該是受到當局歡迎的。考上進士後，田錫原本在太平興國六年（980）要到京西北路任轉運判官，但他「不樂外職」，於是上「升平詩二十章」給太宗，太宗感到十分高興，改授田錫右拾遺、直史館，為清要館職；接著，田錫更上書請求封禪。⁴⁹ 田錫於此時言太平、請封禪應該是有些牽強的，因為該年宋與契丹不時有戰事，境內也發生旱災。⁵⁰ 但顯然「太平」與「封禪」是太宗所渴望，而田錫也順利獲得內職。

透過田錫積極請求封禪的行徑，以及他仕途上的平順，可以了解太宗對類似言行可能頗為歡迎。據稱：

太宗嗣位以來，年穀豐稔，方內乂安，而臣庶上疏獻頌請封禪者不可勝紀。⁵¹

足見宣稱外安內富而請求封禪的臣子實有不少，田錫不過是其中之一。而不斷有臣子上書請求，可見封禪確實是太宗心中所願。前引太宗為太祖寫的〈謚冊〉指太祖開始修封禪禮，則他想要完成太祖的未竟之志，亦屬理所當然。不過，在太平興國八年以前，我們看不到太宗對封禪的積極回應。可以推測，臣僚的歌頌與請願是一回事，「天」是否肯定該君主又是另一回事；在傳統文化制約下，當君主未能完成統一目標，或邊境發生戰爭、境內發生旱災，仍然不能真正說服自己與臣民，認為太平已致。

於是，「銳意太平」的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四年（979）滅掉北漢，接著馬不停蹄的繼續北伐契丹奪燕雲，顯示他急於完成太祖留下的統一任務。⁵² 但不幸遭到挫折，不但兵敗，太宗本人也中箭受傷。⁵³ 此後宋遼兵爭連年不解。太平興國七年，遼景宗（948-982）去世，宋與契丹在邊境上的戰事才減緩。此時，因為戰爭不利，北宋朝廷出現了一些弭兵的言論；太宗雖然多少受這些弭兵論影響，但宋朝兵力還未大損，太宗仍有將來再度北伐的企圖。⁵⁴

⁴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2，太平興國六年九月，頁 494-495。

⁵⁰ 同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四月，頁 492。

⁵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二二·封禪〉，頁 1。

⁵² 蔣復璁，《宋史新探》（臺北：正中書局，1966），〈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頁 104-107。

⁵³ 蔣復璁，〈宋真宗與澶淵之盟〉，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頁 276。

⁵⁴ 見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9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7），頁 63-97。

燕雲並未收復，統一大業似乎還不能說完成，但有趣的是，在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元年，不少臣僚忽視此一客觀事實，太平呼聲興起，封禪的請願更浮上檯面。以下便探討這兩年間趙宋君臣如何謀求太平，甚而自我宣稱太平已致；亦探討太宗君臣在不甚太平卻強稱太平的背後原因。

我們很難推測太宗何時開始為了封禪而積極營造太平景象，不過，太平興國七年，太宗下令緣邊州軍盡力農事，不可侵擾契丹，⁵⁵ 似乎是一個跡象。既然太宗並未放棄收復燕雲，此時卻亟思與契丹保持和平，有可能就是為了能夠進行封禪。此後，太宗特別熱烈地與近臣討論自己目前求治的成果。如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太宗與趙普（922-992）有這樣一段對話：

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群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採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上然之。⁵⁶

據筆者觀察，這是太宗談自我成就的典型模式：太宗常先論唐末、五代時的種種弊政，再對比自己治理下的各種優良政策。他雖然從不正面用「太平」一詞肯定自己，但總是委婉脫出此意。⁵⁷ 趙普則頗為識趣地說，帝王進用良善有助於太平到來，接著再提供自己的看法。對於太宗君臣而言，他們相信在內政上求治，有助於太平的到來。以下還會多次出現類似的表述模式。

就在太宗與趙普談太平之理後的幾天（都在六月），兗州太山父老加上該州七縣民眾一千多人來到汴京請求封禪，太宗表示謙讓不允。⁵⁸ 兗州七縣、上千名父

⁵⁵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太平興國七年十月，頁 528。

⁵⁶ 同前引，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戊申，頁 547。

⁵⁷ 又如太宗向趙普說：「前代亂多治少，皆繫帝王所為。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列族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四月，頁 543。

⁵⁸ 錢若水等，《宋太宗實錄》，收入繆荃孫編，《古學彙刊》第 1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卷 26，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酉，頁 455。又，《續資治通鑑長編》請封禪人數作「四千一百九十三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酉，頁 548。今先從《宋太宗實錄》。

老到汴京請封禪，可能並非自動自發，而是了解上意的官員組織民眾，以製造眾人請願的景象。然而，就在請願進行前不久，黃河潰決，西京河南府「死者以萬計」；⁵⁹ 到了七月，陝西、河北、峽路都遭到嚴重水災。⁶⁰ 這對於想要封禪的太宗而言，可謂是嚴重打擊，等於封禪的願望遭到上天的否定，太宗於是「深憂之」，而問宰相說：「豈朕寡德，致其作沴乎？」⁶¹ 因此，太宗未答應封禪，可能不只是表面的謙讓，而是對自己是否有「德」並無自信，不敢答應。

不過，每當太宗比較自己與前代的治績，他就不免洋洋得意，認為自己的成就已大大超越前代，因此，他不可能停止對封禪的企圖。八年十月，太宗又與宰相討論太平之術，太宗表示「近者內外政事，漸成條貫」，自己「不覺自喜」；⁶² 十一月，又與新任的宰相宋琪（917-996）、李昉討論太平之政：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⁶³

既然認為內外政事都「漸成條貫」，則在賞罰方面，太宗恐怕也不認為自己有何失策，宋琪則稱賞罰至公便可致太平，不無激勵太宗之意。當時雖然也存在指陳時政缺失的言論，但在追求太平的渴望下，令人氣餒的意見可能被忽略或視為個案。⁶⁴

雍熙元年，有幾件事鼓舞了渴望太平的皇帝，其一，潰堤的黃河成功堵塞，太宗開心地作了「平河歌」。⁶⁵ 其二，西邊入寇的戎人遭到擊退，太宗不無得意地說：「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⁶⁶ 該年契丹亦未入寇。其三，該年大體各地皆得豐收，太宗稱這是「上天垂佑」。⁶⁷ 太宗很可能將

⁵⁹ 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六月甲午，頁 546。

⁶⁰ 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七月，頁 549。

⁶¹ 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九月，頁 552。

⁶² 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十月，頁 554。

⁶³ 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子朔，頁 556。

⁶⁴ 田錫上疏指「筦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等數項缺失，得到的回應是「不報」。同前引，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頁 563-566。

⁶⁵ 同前引，卷 25，雍熙元年三月己未，頁 575。

⁶⁶ 同前引，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頁 562；卷 25，雍熙元年三月丁巳，頁 574。

⁶⁷ 同前引，卷 25，雍熙元年九月，頁 587。

這些景象解讀為上天對自己的肯定，該年三月，太宗在宴請百官時稱「天下無事」，與近臣賞花時說「四方無事」，⁶⁸ 之後又與宰相說：

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昔漢秦彭為潁川郡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故也。以一太守善為政猶若此，況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招也？⁶⁹

太宗認為一州郡守為善政，就能招來祥瑞，更何況是天下的君主。這其實是暗指自己身為天子，若為善政，更能招來和氣。太宗用疑問語氣問太平怎會不致，正是在婉轉肯定太平可致。太宗不直接肯定自己可致太平，既是一種謙虛姿態的表現，也透露他過於渴望太平反而顯得小心謹慎的心理。

就在太宗說「何謂太平不可致」的隔月，泰山父老再次來京請求，隨後群臣三次上表，竟然聲稱「近者以昇平斯久」，⁷⁰ 經過三番推讓，太宗終於「勉強」答應封禪。⁷¹ 然而，太宗答應封禪後的隔月，文明、乾元殿失火，當晚雷雨暴作、大雨震電。⁷² 對太宗君臣來說，這是上天嚴正地否定宋朝有行封禪的條件；可以想見，太宗內心受到的打擊可能甚大。於是太宗「訪求讜直，以規己失」；⁷³ 不久又問宰相「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宰相宋琪很可能了解太宗戒慎的心理，安慰太宗：「陛下勞心致治，遠邇無間言。」⁷⁴ 然而，到了月底，太宗多少有點自我安慰地對宰相說：「今時和年豐，行之（筆者按：封禪）固其宜矣」，但

⁶⁸ 同前引，雍熙元年三月己丑，頁 575-576。

⁶⁹ 錢若水等，《宋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三月丙辰，頁 488。

⁷⁰ 同前引，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四月癸巳，頁 20。

⁷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雍熙元年四月乙酉，頁 576。又雍熙元年四月甲辰，因皇帝下詔尚書省討論宋朝應從火德還是金德，徐鉉等人上奏稱：「天造皇宋，……於今二十五年，……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天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同前引，雍熙元年四月甲辰，頁 577。徐鉉等人認為現在已經「恢復一統」，不啻是將未能統一燕雲加以忽略；由於上天垂祐，所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這正是太平之象。徐鉉為南唐降臣，當時被視為是學問一流的學者，同時也是《太平御覽》、《文苑英華》的編者之一，由他領頭上疏將更具說服力；而他的話句句扣合傳統文化中封禪前的太平條件，恐怕亦是用心之言。

⁷² 同前引，雍熙元年五月丁丑，頁 579。

⁷³ 同前引，雍熙元年五月丁亥，頁 580。

⁷⁴ 同前引，雍熙元年五月丁酉，頁 581。

仍承認「未符天意」，只好「徐圖之，亦未為晚」。⁷⁵ 這句話亦透露太宗只是將封禪延後，並未放棄。

觀察太平興國年間，太宗對「致太平以封禪」的追求可說是頗為急切。即位之初，他以「太平興國」為第一個年號，即顯露他企圖以封禪來自我肯定。明白上意的臣僚，也積極地請求太宗封禪，君臣的互相推動，可能又加深了他們渴望封禪的心理。然而，觀察太平興國八年與雍熙元年的局勢，實在很難說此時太宗君臣宣稱的太平是完滿的，與契丹的敵對關係仍未解決，太宗也並未放棄發動戰爭收復燕雲；燕雲未復，趙宋君臣卻刻意忽略；黃河潰堤的水災亦造成數萬人死亡。⁷⁶ 在此情況下，太宗為何還將短暫的風平浪靜視為「四方無事」，而急著想要封禪？考慮到太宗即位之初已有不少臣子請求封禪，如今遭到敗績就放棄封禪，豈非意味自己並非真命天子？若臣子也從此漠然不動，不就表示他們不再相信太宗能長久進行統治？因此，雍熙元年的封禪請願，或許有不得不然的情境在推動。而隱藏於封禪請願背後的是：太宗臨朝九年非但尚未太平，戰亂頻仍更帶來不小的心理壓力，使他欲抓住彰顯片刻的太平表象，以表示上天並未否定自己。然而，太平興國八年的大水災和雍熙元年的雷火，都被看作是上天否定太宗具備封禪的條件。太宗稍經猶豫便放棄封禪，亦顯示他內心深處其實明白太平並未真致，「天意」其實「未符」。

四、端拱元年的轉折與「修德來遠」的提出

雍熙元年暫停封禪後，太宗的對外態度也轉趨積極。雍熙三年，太宗再度北伐，然而這回遭到更嚴重的敗績，軍隊死亡人數前後加總達數十萬。太宗於是「推誠悔過」，不得不放棄收燕雲的目標。⁷⁷ 此後，不僅契丹連年寇邊，西部李繼遷(963-1004)也不時侵擾，這都破壞了「太平」的願望。與此同時，文官主導的北宋

⁷⁵ 同前引，雍熙元年五月壬寅，頁 581。孫克寬曾略提及太宗欲封禪：「太宗朝又曾議封禪，但以火災未得實行，這也是『信道』的先河。因為封禪必祀神，獻祥瑞，道士們便可以夤緣進身了。」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70。

⁷⁶ 田錫在正殿火災應詔求言的上疏中就直言：「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田錫，《咸平集》，卷 1，〈上太宗應詔論火災〉，頁 2b-3a。一方面可見太宗急於宣示太平，另一方面也可見這並未真正說服所有臣僚。

⁷⁷ 張其凡，〈雍熙北征到澶淵之盟〉，頁 25-30。

朝廷，不但不主張強硬對外，反而弭兵論大興。⁷⁸ 對於弭兵論者而言，他們也不能不提出解決外患、實踐太平的策略，他們的答案即是「修德來遠」之思想。所謂「修德來遠」亦屬傳統政治文化，即相信透過在「內政」上講求「德行」以整頓政治，能夠解決「對外」的四夷問題，這與前文論述的以太平之術求太平之象若合符節。以「德」柔服外夷一方面是國力不足下的一種自我寬慰，但另一方面相信有德之君能夠將境內治理得井井有條，進而感召外夷來歸，卻也真實存在於傳統士大夫的政治思維之中。以此，消極的維持和平就產生了積極推展內政革新的動力。⁷⁹ 以下說明「修德來遠」的思想在端拱元年（988）如何因應內、外局勢，而被太宗採納，成為居於主導的政策方針。此思想對於理解太宗後期在外患入侵且軍力不足的情況下，如何還能不放棄太平目標，居於關鍵位置。

考「修德來遠」之說，並非在雍熙挫敗後才出現在文臣的言論中，早在太平興國年間已有一些文臣提倡此論。⁸⁰ 太平興國五年（980），太宗已遭高粱河之敗，當時仍有不少人主張速取幽薊，然而，張齊賢（943-1014）發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

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待也。⁸¹

可見張齊賢認為與其將重心放在攻取幽燕，不如放在安內惠民，並認為依此為政，最終能達到懷來遠人的目的；亦即，取得幽燕根本不必以「力」而可以「德」。太平興國六年（981）田錫上封事諫伐交州，所持論點亦是「修德服荒」，認為如此外夷自然內附。⁸² 由此可見，「修德來遠」之論在太宗前期已出現，這雖是主張愛民、反對戰事的文臣用來說服君王的說詞，但也不能否認他們心裡確實如此相

⁷⁸ 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頁 63-97。

⁷⁹ 「修德來遠」的概念參見梁庚堯，〈從「修德來遠」看曾國藩對外交內政的態度〉，《史繹》，9（臺北：1972），頁 20-24。

⁸⁰ 太宗滅北漢之前，田錫在應開封府試策中，提及對於北漢：「主上但欲修德服匪人之心，養威惜黎元之力，何憂有苗貳固不歸？」田錫，《咸平集》，卷 22，〈開封府試策三道〉，頁 9b。

⁸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1，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頁 484-485。而陳芳明認為張齊賢是高粱河之敗後弭兵論的代表，詳參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頁 70。

⁸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2，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頁 496。

信。只是對於仍不放棄以武力收復燕雲的太宗而言，文臣的說詞難以入耳。

雍熙三年五月，太宗遭到空前的軍事挫敗，此時，已去相兩年多的趙普，適時地上疏給太宗。《續資治通鑑長編》對趙普上疏的內容與過程詳加引述，可見其重要性。當中論及：

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算，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臣今獨興沮眾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頒明詔，速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⁸³

趙普首先稱頌太宗過去十年的政績已達「康濟」，接著提出應對契丹的方針——無為，此「無為」並非全無做為，而是主張將契丹「置之度外」，認為若能「安和寢膳，惠養疲羸」，契丹自然也會來附。太宗答趙普的手詔解釋自己之所以欲取幽薊，是「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⁸⁴ 趙普又上謝表，請太宗：

端拱穆清，耆神和志，以無為無事，保卜世卜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塞，與戎人較其勝負？⁸⁵

趙普「端拱」、「無為」的建議提供了接下來處理與契丹關係的方案，但太宗此時正處在戰敗的痛苦挫折中，一時尚未決定接下來如何行事。

不久，太宗又問近臣接下來該如何是好，身為宰相的李昉，大膽地提出和議主張：

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磬縣，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

⁸³ 同前引，卷 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頁 614-615。

⁸⁴ 同前引，頁 617。

⁸⁵ 同前引。

塵。此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以上者也。⁸⁶

即以金錢賄賂的方式，由邊臣向契丹暗示和議之事。事實上，太祖末年與契丹的和談，就是由雙方邊臣磋商而成，⁸⁷ 因此李昉提出此論有前例可循，不能說是過於突兀。若與趙普提出的「無為」、「置之度外」的消極對策相比，李昉的主和論更為明確，也能更快消弭兵禍；⁸⁸ 然而，對於軍事挫敗、顏面無光的太宗而言，此時提出「屈己」的和議論，卻可能頗為刺耳。雍熙年間，太宗下詔群臣上言禦戎之策，可見此時太宗的對外政策仍未定調。其中殿中侍御史趙孚的上奏，結合了修德來遠與和議二論，認為「況吾同類，何難以德化。……此時猶須行禮命之書，通和之事，自然馴致率服，永無戰爭，復三皇道德之風，廣一統太平之業。」⁸⁹ 趙孚此論的根本訴求顯然是主和，只是包裝了修德來遠的美稱，兼顧了君主的顏面。而「一統太平」之說，在太祖末是要以武力統一，如今在趙孚口中，卻是要以和議達成，是否要以金錢贖回燕雲亦未明言。可見「一統太平」在程度和方法上，隨著宋朝軍力的削弱，已有根本的改變。

趙普和李昉對契丹的不同路線，在端拱元年獲得解決。雍熙四年底，趙普來朝，君臣相見，彼此都十分感動。我們無法確定太宗是否已經決定再相趙普，不過此時太宗次子元僖（966-992）上奏給太宗，認為若再用趙普「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淨之治。」⁹⁰ 呼應了雍熙三年趙普端拱無為的主張。次年，太宗改元「端拱」，正表明太宗採納了趙普的意見。端拱元年二月，李昉罷相，趙普復相，亦顯示趙普路線得到太宗接納。⁹¹ 與趙普一同拜相的還有呂蒙正（946-1011），其拜相制也表明「端拱」之意，正是欲無為而治。⁹² 四月，太宗下〈誠沿邊毋得侵擾詔〉，表達了息兵於幽薊的願望；並准許宋遼邊境貿易，可能希望藉此緩和契丹的寇邊。⁹³ 此息兵於邊的方針，正呼應了端拱無為的政策。

⁸⁶ 同前引，雍熙三年六月戊戌，頁 618。

⁸⁷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84），頁 19。

⁸⁸ 雖然，李昉並未考量在大敗之後求和，可能得付出更大的代價。

⁸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8，雍熙四年四月，頁 636-637。

⁹⁰ 同前引，雍熙四年十二月，頁 641。

⁹¹ 其間牽涉到複雜的權力鬥爭，見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頁 24-27。

⁹²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收入趙鐵寒編，《宋史資料萃編》第 1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2，頁 14。

⁹³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卷 214，〈保疆·誠沿邊毋得侵擾詔〉，頁 814。

端拱元年標示了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從以武力奪取燕雲，轉為主張「修德來遠」，認為君王在內政上的勤於治理，最終將使外夷來附。咸平三年（1000），知兗州韓援（生卒年不詳）上書給真宗，回憶了「端拱」時期的關鍵性：

臣伏觀先帝福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幾，自端拱已來，益勵精為理。⁹⁴

韓援的回憶可能符合實情，當太宗放棄以武力解決邊患，他還能憑藉什麼追求太平呢？要如何才能獲得上天的肯定呢？更加勤於政務以「修德」是太宗所能做的，亦可視為對「太平之術」的追求。例如，太宗原本就十分重視刑獄，總是擔心冤獄會傷了天地和氣，端拱以後，太宗決定親自選擇諸州掌管司法的司理參軍。⁹⁵ 對太宗而言，刑罰若能清明，便能感召上天的和氣，是他修德的重要一環。

端拱二年，因應契丹的持續擾邊，太宗下詔群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在「端拱」的政策基調下，文官雖也提出具體的防禦政策，但仍多將「修德來遠」視作主要方針。如王禹偁（954-1001）提出內、外各五項建議，其中對內主張「併省官吏、艱難選舉、信用大臣、不貴虛名、禁止游惰」，並將這些意見概括為「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之法。⁹⁶ 知制誥田錫的奏疏則提出：「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靜而邊鄙安。」⁹⁷ 知制誥王化基（944-1010）面對太宗詢問邊事，認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鄙何患乎不安。」⁹⁸ 在「修德來遠」的政策方針下，我們注意到，太宗雖然問的是備邊之策，不少文臣的上言竟把重點放在內政。⁹⁹ 可以想見，邊防本非文臣所長，他們在修德來遠的前提之下，能夠很合理的從自身擅長

⁹⁴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7，咸平三年十二月丙寅，頁 1035。

⁹⁵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審判職能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 106-107。司理參軍屬於官僚最底層的「選人」，原本遠不足以由皇帝親自選擇，又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十月庚申，頁 754。

⁹⁶ 同前引，卷 30，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頁 671-674。

⁹⁷ 同前引，頁 677-678。

⁹⁸ 同前引，端拱二年九月戊子，頁 687。

⁹⁹ 本文並非認為所有文臣皆主張「修德來遠」，畢竟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錄的諸臣奏議中，只佔當時上奏的一小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修德來遠」是不少文臣的思考模式，更重要的是，本文透過分析端拱元年前後的政局變化，指出「修德來遠」之論得到太宗的支持。

的內政問題提供意見，不致於在邊事問題上捉襟見肘。¹⁰⁰ 這些言論也反過來鞏固修德來遠的政策方針。

端拱元年，可說是為太宗後期的政策方針定調的關鍵時期。學者注意到淳化年間 (990-994) 太宗向宰相表示要以「清淨致治」，¹⁰¹ 其中，太宗主動說出「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常修德以懷遠，此則清靜致治之道也。」¹⁰² 事實上，此主張早在端拱時期已經形成，並非晚至淳化年間才如此。雍熙年間的軍事挫敗，導致太宗必須重新思考對外方針，此時趙普提出的「修德來遠」、四夷置之度外之說，為太宗找到一不失顏面的解套方法；往後文臣繼續支持修德來遠之說，更強化了此政策的正當性。所謂「端拱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是在邊事問題上採取消極的態度；在內政上，「修德來遠」的提出，則為軍事挫敗引起的邊患找到應對方式，太宗從此更加勤於政務，期望藉由對內修德達致太平理想。然而，「修德」是否真能「來遠」？趙宋真能因此太平嗎？以下繼續探討。

五、宋太宗後期的致太平以封禪

對太宗而言，北伐失敗打擊了他收復失土的信心，契丹的持續寇邊使宋朝離「太平」更加遙遠，短命王朝的陰影再度籠罩在太宗心靈深處。「致太平以封禪」成為他更加迫切的渴望，「修德來遠」則是他達成此目標的方法。然而，「修德」如何可能讓外敵放棄侵邊呢？以下，我們將討論太宗後期如何因應內外局勢，不斷找機會宣稱太平已致，並持續企圖推動封禪，也以此驗證「修德來遠」的實質與效用。

端拱改元，「修德來遠」成為施政方針，此間太宗的一連串言行，充分顯露他急切的求治心理。端拱元年正月十七日，太宗舉行「籍田」大禮，表達對農事的高

¹⁰⁰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pp. 126-127. 當中指出文臣的反戰立場，與他們在軍事上的無能為力及無法在戰事決策權上與武臣競爭有關。這與他們雖明知解決邊事是致太平的前提，卻仍將注意力放於內政上，可相呼應。

¹⁰¹ 張其凡認為呂端具有黃老思想並非偶然，宋初四十年間（太祖到真宗前期）黃老思想十分盛行，參張其凡，《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呂端與宋初黃老思想〉，頁267-287。但實際上，太祖到太宗前期，兩位皇帝並未對道教有太多青睞；李華瑞指出太宗淳化年間「愈來愈有意識地倡導黃老清靜思想」，政治趨於保守，參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27。

¹⁰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頁758-759。

度重視，背後隱藏著太宗對豐年的渴求。¹⁰³ 此時，田錫又上〈籍田頌〉，稱：「聖主文明，時方太平」，最後請求：「登封降禪，願陛下行之。」¹⁰⁴ 太平與封禪，可能正說中太宗行籍田禮背後的真正願望。

端拱元年三月，太宗又特別下詔求言，據稱此時太宗「厲精圖治，欲聞讜論，以致太平。」¹⁰⁵ 年底，太宗又滔滔不絕地與宰相趙普討論太平之政：

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果不難致。」¹⁰⁶

太宗近乎習慣性地比較自己與五代，認為已經革除了權在方鎮的弊病，如今要做的就是守法制、振綱紀，可說是太宗「修德」的方式之一，期望以此致太平；接著，太宗又想到至公無偏亦是修德之法，認為能做到這些，太平並不難致。這可說是太宗談太平的典型方式，即透過今昔對比，並從側面自我肯定。

不過，太宗的這些談話似乎刻意在論太平時，忽略與契丹的沿邊戰事。若端拱元年確實境內豐收，太宗為何只能謙稱德化未洽，而將太平視為未致的目標？骨子裡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契丹持續對宋進行報復性的侵略；¹⁰⁷ 並且，李繼遷也不時寇邊。¹⁰⁸ 端拱元年三月，應詔上疏的謝泌就指目前「外患方熾，民政未乂」。¹⁰⁹ 太宗在此情況下仍宣稱太平不難致，反映他持守修德來遠的原則外，同時也為自己和

¹⁰³ 端拱元年正月，籍田次日，太宗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並說：「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同前引，端拱元年正月丙子，頁 646。太宗表面謙稱自己德化未洽，天卻賜給累歲的豐年；言下之意可能是累歲的豐年，不正是天暗示自己有德、足以動天嗎？又同年二月，太宗跟宰相說：「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同前引，端拱元年二月丙午，頁 648-649。

¹⁰⁴ 田錫，《咸平集》，卷 21，〈籍田頌并序〉，頁 4b-6a。

¹⁰⁵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9，端拱元年三月甲子，頁 649。

¹⁰⁶ 同前引，端拱元年十二月，頁 662。

¹⁰⁷ 王曉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的對遼策略〉，《四川大學學報》，4（四川：2000），頁 100-106。

¹⁰⁸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8-19。

¹⁰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9，端拱元年三月，頁 650。

群臣的消極對外找到合理的說法，即：就算外敵窺伺，太平仍會因己德而達成。

令太宗更加失望的是，端拱二年，外患未平，八月，彗星出現。彗星被認為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太宗為此深自引咎。該年又發生旱災，太宗向四方禱告，「皆弗應」。可以想見，端拱元年仍為豐收而表現得沾沾自喜的太宗，第二年就遇到旱災與彗星，他不得不懷疑，上天是否對他的統治感到不滿，於是他向宰相說：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為犧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¹¹⁰

由於無法確定是刑政還是農事的缺失觸怒上天，因此他要宰相都加以留意。在外有強敵、內遇天災的情況下，太宗找不到任何自我認可的依據。不惜自焚的激烈言論，顯示太宗亟欲挽回天心，不願接受「不難致」的太平離自己越來越遠。

端拱年間的動亂，與「修德來遠」的方針形成諷刺的對比。然而，到了淳化初期，局勢有了好轉。端拱二年，契丹進攻宋境，遭到擊潰，於是暫時改變對宋的進攻策略，著力於內部改革。¹¹¹ 另一方面，侵擾宋朝西邊的李繼遷，在端拱元年接受趙保忠的賜名，淳化二年（991）又奉表假意歸順。¹¹² 西、北獲得安寧，為太宗的太平夢製造了絕佳機會。以下討論淳化年間太宗君臣如何繼續追求太平的到來。

邊事的和緩可能讓太宗以為距離太平理想又近了一步，若是獲得豐收，便可能宣告太平。然而，淳化二年三月發生嚴重蝗旱，太宗再度激切地向宰相說，若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¹¹³ 六月，汴水又潰堤，太宗竟然天未亮就乘著步輦出宮門，「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¹¹⁴ 種種可謂誇張的言行，真實映照出太宗追求太平的激切之心。

經過多年的努力求治，特別是端拱以後致力於修德之政，到了淳化三年

¹¹⁰ 同前引，卷 30，端拱二年十月，頁 688。

¹¹¹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23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77；王曉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的對遼策略〉，頁 100-106。

¹¹²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9、23。

¹¹³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2，淳化二年三月己巳，頁 713。

¹¹⁴ 同前引，淳化二年六月，頁 716。

(992)，太宗又找到宣稱太平的空隙。過去不時對祥瑞表示不以為然的太宗，¹¹⁵ 該年正月，卻「取嗣位以來祥瑞作《祥麟》、《丹鳳》、《白龜》、《河清》、《瑞麥》五曲。」¹¹⁶ 為祥瑞作曲，顯示太宗欲宣稱自己受到上天的肯定，透露太宗想要封禪的意圖。宋初名臣徐鉉 (917-992) 於淳化三年去世，次年他的弟子陳彭年 (961-1017) 為其文集作序寫道：

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達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¹¹⁷

顯示徐鉉去世之淳化三年，正是太宗欲行封禪之時。然而，這次封禪的企圖並未浮上檯面，原因可能是該年五月又發生旱災，太宗「憂形於色」，他不懂為何自己這麼努力，¹¹⁸ 仍不能獲得上天的肯定。因此他向再度任相的李昉說：「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於是他將破壞太平之政的原因歸咎宰相，「切責」李昉，倒楣的李昉只好上表待罪，¹¹⁹ 然太宗在答詔中仍不敢不向天承認自己有過：

¹¹⁵ 前引太宗在雍熙元年四月下詔封禪的前一個月，曾提及漢郡守治下的「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認為是善政的反映，顯示太宗對祥瑞抱持正面態度。群臣請求太宗封禪，曾指「況今上瑞仍臻」，太宗在答群臣之請也說：「屬九服清宴，四時順成，祥瑞薦臻」，聲稱出現祥瑞，正是為封禪製造有利輿論。錢若水等，《宋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四月辛卯、癸巳，頁 491。然而，一旦太宗暫停了封禪活動，他對祥瑞的態度也發生改變。該年十月，嵐州獻上一「牝獸」，太宗不但未表欣喜，反而說：「符瑞之事，非朕所尚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雍熙元年十月癸巳，頁 588。雍熙二年，坊州又獻一「角獸」，近臣查看後，都宣稱是「麒麟」，之前嵐州所進是「麟」，並請求宣示中外，太宗不許，且說：「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同前引，卷 26，雍熙二年閏九月己亥，頁 599。太宗前後不一的態度看似令人困惑，但若對照太宗封禪企圖的時辰表，就可發現太宗在封禪前，對祥瑞表示歡迎，一旦不打算封禪，對祥瑞的態度就變得「不以為然」。換言之，太宗只是遵照傳統的封禪條件，將祥瑞視為能夠舉行封禪的象徵，其態度是實用性的，而非對祥瑞的神秘色彩深信不疑。

¹¹⁶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五六·朝會〉，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條，頁 5。

¹¹⁷ 徐鉉，《徐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徐公集序〉，頁 3-4。

¹¹⁸ 太宗在內政上的諸多作為，見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41-53。

¹¹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十八·祈雨〉，頁 3-4。

近年以來，仍歲蝗旱，稼穡不稔，民多流亡。朕夙夜罪己，勵精引咎。……朕已洗心知過，改行自新。¹²⁰

對於企圖封禪的太宗而言，蝗旱災是上天的否定，他似乎緊張到亂了分寸，不知錯在自己還是宰相，但誠懇的向天承認過失，仍是他企圖挽回天心的方法。

不過，只要太宗不想讓宋朝成為短命的第六代，封禪企圖就不會因一時的天災而放棄。他一方面仍向宰相說「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另一方面則抱怨在位之人「競為循默」。¹²¹ 或許並非巧合，淳化四、五年，各地愈加頻繁地獻上祥瑞，¹²² 這暗示上天認為太宗是有德之君；據說太宗「多抑而不舉」，但當宰相要求觀看祥瑞時，太宗仍將密州所獻的芝草拿出來展示。¹²³ 然而，讓太宗失望的是，淳化四年又發生大水災。太宗認為「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宰相、執政再度遭到太宗嚴厲責備，¹²⁴ 不久，李昉等人就被罷除了職位。¹²⁵ 淳化五年（994）正月，太宗與新任宰相呂蒙正有這樣一段對話：

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直。¹²⁶

太宗「否極泰來」的一段話，不啻是曲折婉轉地暗示五代亂世已過，太平日子已致；「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正顯示太宗頗滿意自己的治績。太宗不直接肯定當前已太平，恰反映他對太平的極度渴求，以致盼望是從他人（宰相）口中來加以肯定。然而呂蒙正並未迎合太宗，反而說太宗不過是看到眼前景象，而未見都城外眾

¹²⁰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卷 151，〈政事四·答李昉等待罪璽書〉，頁 561。

¹²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五月壬寅，頁 748。

¹²² 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瑞異一·祥瑞雜錄〉，淳化四年、五年，頁 8-9。

¹²³ 同前引，淳化五年正月，頁 8-9。

¹²⁴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九月，頁 752。

¹²⁵ 同前引，淳化四年十月辛未，頁 753。

¹²⁶ 同前引，卷 35，淳化五年正月，頁 765-766。

多因飢寒而喪命的百姓。太宗「變色不言」，大概便是因為欲宣稱的太平，遭呂蒙正不留情面的否決。

可能更令太宗氣餒的是，就在他以為「否極泰來」後不久，淳化五年四月，李繼遷再度反叛。太宗欲「修德來遠」，於是向李繼遷示好，並考慮放棄對夏州政權的削藩念頭；但李繼遷有契丹支持，有恃無恐，繼續攻擊靈州重鎮，太宗不得已只好向李繼遷大規模進討。¹²⁷ 可能為了避免契丹與李繼遷聯合，該年八月，更遣使向契丹求和，但遭到拒絕，九月，再度放低姿態，遣使展現和好誠意，卻依然被拒。¹²⁸ 至道元年（995），契丹將領韓德威誘使党項部族入侵。¹²⁹ 外患接踵而至的同時，四川爆發李順、王小波之亂。¹³⁰ 外患加上內亂，嚴重破壞了太宗的太平之政，也暴露了「修德來遠」的不切實際。對太宗君臣而言，這還意味著太宗之德不足以來遠，甚至連安內都有問題。事實上，當太宗進攻李繼遷並遣使求和契丹，便已顯示自己所修之德，不足以「來遠」；只是表面上，太宗不能放棄修德來遠之說，否則一旦承認自己無德，太平將更加遙遙無期。

至道元年，幾經挫折的太宗又找到了統治生涯最後一次謀求太平的機會。該年契丹與李繼遷都遭到宋將的擊退，四川亂事也漸平息。四月，「亢直」的呂蒙正罷相，改由呂端（935-1000）任相。五月，太宗向呂端說：

國家歲入財賦，兩倍於唐室。且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于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苟前代措置得宜，則已致太平，豈復煩朕思慮也！¹³¹

¹²⁷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22-23。

¹²⁸ 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3，〈聖宗四〉，頁 145。蔣復璁亦指出太宗後期已決心求和，先由秘密接洽，再正式遣使，參蔣復璁，《宋史新探》，〈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頁 118-119。又淳化五年七月，高麗受契丹攻擊，來向宋求兵援，太宗以「北邊甫寧，不可輕動干戈」為由拒絕，以致「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也顯示太宗欲與契丹保持友好的決心，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淳化五年七月庚戌，頁 789-790。除了淳化五年的求和，《遼史》又記錄太宗於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亦曾遣使求和，參脫脫等，《遼史》，卷 10，〈聖宗本紀一〉，頁 108。但該時太宗雖欲暫時休兵，並進行封禪典禮，但畢竟還沒放棄收燕雲，則該時是否會遣使求和，是有疑問的。

¹²⁹ 王曉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的對遼策略〉，頁 100-106。

¹³⁰ 淳化五年八月，田錫上書時便說：「河西尚警，劍外未寧」。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淳化五年八月，頁 794。

¹³¹ 同前引，卷 37，至道元年五月，頁 815。

既說前代若處置得當，則已太平；又說如今財賦兩倍於唐代，豈不是再度側面肯定太平已致？隔日，還是開封尹的真宗，獻上祥瑞「玄兔」一隻，太宗對呂端說：「玄兔之來，國家之慶也。」呂端頗為識趣的說：「兔即陰類，夷狄之象。華為中國，中國陽也。將有夷狄入朝，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¹³²這正是呂端對修德來遠概念的運用，認為太宗之德足以使夷狄來附，國家也將獲致太平。至道元年是難得的豐收年，該年年底太宗熱烈地與宰相討論自己的治績：

國家自近歲以來，鍾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紀，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餘妖，竄伏黔水，繼遷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普天之下九穀咸登，……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¹³³

太宗生動的訴說自己過去的憂懼，並對比如今內外皆安的情勢。所謂「內修政紀」，自然可以看作太宗對「修德來遠」的實踐，但太宗可能做得更多，他在實際作為上，並不謹守修德來遠，而是積極地「外勤戎略」。對於如今的成就，太宗認為已「否極思泰」，顯然他又在暗示太平的到來。然而就在太宗聲稱李繼遷困窘於沙漠後不久，至道二年五月，李繼遷又率萬餘眾寇靈州，天文星象顯示秦地人民將受災害，太宗為此嘆氣不已，¹³⁴ 宋朝不得已再與李繼遷開戰。隔年三月，太宗與世長辭。到了八月，以真宗名義所上的太宗諡號寶冊提及：

¹³² 同前引，至道元年五月戊辰，頁 815-816。至道元年四月，知通利軍錢朝序，表獻部內赤烏、白兔各一，云：「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馴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館。」從之。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同前引，至道元年四月乙巳，頁 813。

¹³³ 同前引，卷 38，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頁 823。

¹³⁴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上因嗟歎久之。」同前引，卷 39，至道二年五月，頁 834。其中熒惑即火星，參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中國星占學上最凶的天象“熒惑守心”〉，頁 23-48。而此處天文星象和人間災害的關聯，則牽涉到「分野」的中國天文學思想，是天文星象與地理位置的對應觀念，可參見陳遵媯，《中國天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83-287。

方將鳴鑾東夏，檢玉介丘，而天禍忽臨，仙駕長往。¹³⁵

透露太宗末年又一次策劃封禪。然而時不我予，邊境動盪與內部天災一次次挫折太平的願望，那還在臺面下醞釀的封禪盛典，只能無聲無息地消散在歷史現實中。

最後須補充文臣對封禪的請願與對太平之政的建議。既然「致太平以封禪」是太宗的政治目標，自然有臣僚上書表達支持。淳化年間，太宗積極追求封禪，了解上意的臣僚，自亦不時勸太宗進行封禪。淳化二年，監察御史張觀（生卒年不詳）上奏，列舉多項政治缺失，最後一項即是「封祀猶闕」。¹³⁶ 可見他將封禪視為該行而未行之事。淳化四年正月，太宗大赦天下，時被貶為海州團練副使的田錫獻上〈賀大赦表〉，稱：「鳳儀九成，方樂升平之化，山呼萬壽，佇觀封禪之儀。」¹³⁷ 田錫一方面歌頌太平，另一方面則表示自己等待著封禪的舉行。¹³⁸

除了請求封禪，自然也有文臣在「修德來遠」的框架下，從內政提供一己的太平之術。然而，我們注意到有些臣子口中的「太平」已從「目的」轉化為說服皇帝的「手段」。例如端拱元年太宗下詔求言，直史館羅處約（960-992）便建議廢除三司之制，恢復十二員判官的古制，認為如此能「順考古道，致乎治平」。¹³⁹ 又如淳化四年十二月，三司右計判官梁鼎（955-1006）上疏主張恢復官員考課之法，否則無法懲勸貪懦之官，以免導致「水旱薦臻，訟獄盈溢，望天下之承平，豈可得耶？」¹⁴⁰ 我們很難分辨這些文臣是為了助太平之策而提供種種意見，還是為了說服皇帝施行自己的建議，而以有助太平為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太宗急切的渴望太平，臣僚的奏書當然不可能略此不提，而為政策冠以有助致治之說，也可能使皇帝更加慎重考慮自己的意見，對其仕途的發展至少有益無弊。

觀察太宗後期的施政，可以看出「致太平以封禪」仍是他最終的政治目標，甚至，為了擺脫大敗的恥辱感，與隨之而來對政權的不安全感，他比過去更需要透過

¹³⁵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九·歷代大行喪禮上〉，至道三年八月二十六日，頁13。

¹³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淳化二年二月，頁712。

¹³⁷ 田錫，《咸平集》，卷1前附錄，〈田司徒墓誌銘〉，頁1b；卷25，〈賀大赦表〉，頁1b-2a。

¹³⁸ 早在雍熙四年，即北伐大敗後的次年，田錫上〈封禪書〉，認為「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同前引，卷1前附錄，〈田司徒墓誌銘〉，頁2b；上書時間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8，雍熙四年九月丙子，頁639。這似乎意味戰敗與未能收復燕雲，並不妨礙宋朝追求太平。此時太宗尚未決定未來將如何行事，但田錫的上書，對戰敗的太宗而言，無疑仍是鼓舞。

¹³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端拱元年十二月，頁661-662。

¹⁴⁰ 同前引，卷34，淳化四年十二月，頁760。

宣稱太平可致來安慰自己。檢視太宗後期致太平的方法，可察覺以武力「一統太平」的積極論調消失無蹤，太宗總是以強調自己在內政上的成就遠過五代，來暗示太平不遠。這顯示太宗依照「修德來遠」的方針，在內政上用力琢磨，而將四夷置之度外。然而，太宗雖然在內政上更加勤力，實際上並未在邊事上真正無所作為。只是，太宗的對外行動，以消極的維持和平為主要訴求，而不以壓制敵人為目的；這自然是太宗在軍事實力不足，又欲速致太平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策略。而「修德來遠」的說法，就反過來包裝了軍事上軟弱退縮的態度。那麼太宗是否獲得了長治久安的自信？我們看到，每當太宗找到時機婉轉暗示太平已致，不是發生嚴重水旱災，就是契丹與李繼遷輪流寇邊；這對太宗內心所造成的挫折與憂懼，透過他激烈自譴的言語表露無疑。退一步而言，即使幾次暗示太平有望，也不過是建立於外患暫無侵擾的前提，而非真正解決外患。在此情境下委婉暗示太平，表面是對修德來遠的自信，實際上是太宗想要告訴群臣，即使經過多次挫折，他依然會是上天選定的真命天子。而真正藏於太宗內心深處的，恐怕是對自我成就的缺乏信心，需要靠著看似樂觀的話語和群臣的恭維來抵除對政權的不安全感。

六、宋真宗咸平年間對「修德來遠」的放棄

宋太宗末年，契丹再度寇邊，西邊與李繼遷的戰事又起，太宗所渴望的太平，顯然並未達成。真宗即位後，面臨此危局，帶領宋朝走向太平境地，自然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澶淵之盟簽定前的咸平年間，宋與契丹、李繼遷的戰事仍時常發生。那麼，自稱事事循守父訓、遵行先朝成憲的真宗，¹⁴¹ 是否在致太平的方針上，遵循「修德來遠」之論？或者做了什麼樣的調整？而文臣們又如何引導年輕的皇帝走向太平？亦即，面對仍未徹底擺脫的短命陰影，真宗君臣如何思考、如何面對？以下論之。

首先討論文臣在對外關係上提出的意見。至道三年（997）九月，真宗即位不久，有壽州獻上綠毛龜，宰相呂端將之解釋為：

將有剛獷不賓之人，柔伏來庭乎！……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

¹⁴¹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頁 95。鄧小南認為：「遵行先朝成憲，保守祖宗基業——這是理解真宗前期政治施為的關鍵之一。」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頁 290。

從之黨，亦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伊夕。北戎倔彊，為患滋深，部族攜離，復荐饑歉，必恐相率懷柔，願伸欸附。¹⁴²

呂端對綠毛龜的解釋看似匪夷所思，但瞭解到太宗後期以來盛行的修德來遠之說，便可知呂端認為李繼遷和契丹部落將內附，實是在此思想影響下做出的推論。這與他在至道元年對「玄兔」的解釋實為異曲同工。

咸平二年三月，朱台符 (965-1006) 聲稱契丹已經十年未來犯塞（筆者按：此不符事實），竟然推論真宗若能「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筆者按：契丹）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進而請真宗仿效太祖故事，與契丹講和。最後他又指出真宗如今「守文繼統，欲致太平」，更應該「務德化頑」，而不該與不識禮義的外夷爭氣力。¹⁴³ 朱台符的言論實亦不出修德來遠之意；然而，考量到朱台符整篇奏議最具體的主張——仿太祖故事，與契丹和議，則其言論未嘗不是用來包裝和議的精心巧思。類似的言論還有咸平四年 (1001) 秘書丞、知金州陳彭年的上疏，舉唐太宗用魏徵意見而「致太平」的例子，暗示真宗若能行自己建議的五項「王道」：「置諫官、擇法吏、簡格令、省官員、行公舉」，便也能夠致太平；文末，他請求真宗「建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宗而禮百神」，如此則「天下之民無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而來矣。」¹⁴⁴ 陳彭年對外夷的思考，亦明顯脫胎於修德來遠之說，終極目標無非是登泰山封禪。

若對照咸平年間契丹入侵的時程表，¹⁴⁵ 可知上述幾位文臣言事的時間點，正好未碰上嚴重戰亂。然即便咸平五年西部戰事正如火如荼展開，契丹亦不時寇邊的時刻，田錫的上奏仍要求真宗注意擇相、選才，否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¹⁴⁶ 在邊境動蕩的節骨眼，仍要真宗將注意力集中於內政，深刻反映「修德來遠」對文臣思考邊事問題的影響。

¹⁴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2，至道三年九月，頁 886。

¹⁴³ 同前引，卷 44，咸平二年三月，頁 931-933。

¹⁴⁴ 同前引，卷 48，咸平四年二月，頁 1046-1050。

¹⁴⁵ 參張其凡，〈雍熙北征到澶淵之盟〉，頁 25-30。

¹⁴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1，咸平五年正月丙寅，頁 1113。早在至道三年七月，即真宗即位之初，田錫便上疏請求捨棄靈武以弭兵，接著，田錫談到關輔地區的地震問題，認為「禳此災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圖。」上疏次日，田錫面奏真宗，認為必須花三十年的時間教民、化民，「然後致太平，然後臻至理。」同前引，卷 41，至道三年七月，頁 870-874。田錫的議論不出「修德來遠」的思想，請求真宗將四夷置之度外，將重心放在愛民之上。

由上述可知，雖然咸平年間，契丹與李繼遷相繼寇擾，給宋朝帶來頗大的危機，但文臣們似乎未能提出新的應對方式，「修德來遠」仍是常見的主張。我們沒有證據否定文官們真心相信修德來遠之說，但當外患持續困擾帝國，他們依然固守此論，便也暴露了他們無能為力的真實處境。從另一角度來看，盛行已久的「修德來遠」之論成了他們的護身符，使他們能合理地避開邊事。只談他們較擅長的內政改良建議，認為如此便可致太平，實現封禪願望。¹⁴⁷ 甚至，與太宗後期近似，從一些文臣的言論可以觀察到另一種主從論述：說服皇帝採納自己的建議是他們的目的，為自己的建議飾以太平之說反而成了一種手段。¹⁴⁸ 可以想見，當「太平」成為趙宋君臣矢志欲達的目標，「太平」的論說就轉化為一種可利用的政治資源，當臣子提倡某項改革，「致太平」成了足以用來說服皇帝的說辭。

對真宗而言，當他面臨西、北戰事皆爆發的處境，要如何解決邊患，以完成太宗未竟的太平之志？「修德來遠」之說，在太宗後期已成為主調，咸平年間又有不少文臣以此為思考模式提出意見。此一說法對真宗有何影響，實質上是否遵行「修德來遠」之法？以下加以探討。

首先觀察真宗是否認同修德來遠之說。咸平四年，真宗和宰執的對話，牽涉到對君德的看法：

¹⁴⁷ 真宗即位以後應該也有不少臣子請求封禪，或渴望看到封禪，除了前文提及的田錫和陳彭年等人外，宋初名臣王禹偁同樣渴望看到封禪。真宗即位後，王禹偁任知制誥，作〈寓直偶題〉：「兩朝書命媿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白首猶期議封禪，一隨鑾輅見燔柴。」見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正編》第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11，〈寓直偶題〉，頁82；而咸平元年官貶黃州時，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見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頁7。

¹⁴⁸ 例如咸平二年八月，孫何（961-1004）上疏，內容主要是請求廢三司，重建戶部之職。其中他提到：「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5，咸平二年八月，頁958。對孫何來說，要如何說服皇帝廢除行之已久的三司？利用建太平之業的說詞，顯然有助於引起皇帝的注意。又如本文多次提及的田錫，他在咸平初出知泰州，近三年不能還京，田錫一向「不樂外職」，咸平四年，他寫了〈泰州乞替〉，近乎卑微的表示自己「身在江湖之上，心歸魏闕之下。……旦夕望替，益憂疎遺。」田錫，《咸平集》，卷27，〈泰州乞替〉，頁9a。於是真宗如田錫所願，詔他回京。田錫面奏真宗，表示自己願以「皇王之道」助真宗致治，田錫所謂皇王之道，便是要刪略經史子集為三百六十卷，讓真宗日讀一卷，便能知理亂興亡之事。真宗支持他的修書計畫，下令史館將所有書籍借他覽閱，接著田錫上〈奏乞不差出〉，表示修書須花十年的時間，與其差出一郡，不如留在館職「常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並認為真宗「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必十年之內致太平。」同前引，卷27，〈奏乞不差出〉，頁13-14。或許不必否定田錫真誠地想為皇帝編一部有助治道的書，但肩負編書的任務，也讓田錫成功擺脫外任的可能性。

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上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今陛下克己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¹⁴⁹

王繼英 (946-1006) 和陳堯叟 (961-1017) 對真宗的恭維，被真宗一一否定。我們無法完全還原當時君臣對話的語境，真宗到底只是謙虛或是真不認為自己有德，難以分辨；但相較於太宗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肯定自己，真宗倒是很直白地否定了自己。又如咸平六年，天文出現不祥的星象，真宗問宰相自己到底哪裡沒做好，宰相李沆回答：「陛下修德布政，實無所闕。」但真宗仍回答：「朕德薄，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¹⁵⁰ 再如該年底，將領李繼隆請真宗不要親征，真宗的回答是：「今外敵歲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此朕所以必行也。」¹⁵¹ 真宗自然熟悉文臣常提及的修德來遠之說，但他明白表示契丹無法以德服。真宗既然否定自己有足夠的德性，就不可能聲稱己德能夠來遠，文臣的說詞，顯然並未說服真宗。對照咸平年間的外部局勢，不但契丹持續入侵，李繼遷也不斷寇擾西部，真宗若持修德來遠之說，又豈非更加暴露自己無德？因此，真宗對修德來遠之說的否定，既是展現他務實謙讓的態度，也是在局勢逼迫下不得不然的應對。

既然真宗不認為己德能夠來遠，則他要用何種方式解決外患？咸平二年五月，真宗探問武將曹彬 (931-999)，曹彬提及太祖時與契丹和好，言下之意是勸真宗也與契丹和議，真宗回答：「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¹⁵² 可見真宗雖傾向和議，但他清楚的意識到必須爭取有利的議和條件。咸平二年底，契丹南侵，真宗下詔親征，坐鎮大名府指揮軍事。¹⁵³ 親征的舉動，正顯示真宗對契丹的態度轉趨積極。該時王濟 (952-1010) 被派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但王濟認為「役廣勞民」請求暫緩，宰相張齊賢要王濟能夠保證河不潰決，王濟卻要張齊賢保證「天下太平」，自己才願保證河不潰決。張齊賢反問：

¹⁴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9，咸平四年十月，頁 1074-1075。

¹⁵⁰ 同前引，卷 55，咸平六年十一月，頁 1218。

¹⁵¹ 同前引，咸平六年十二月，頁 1219。

¹⁵² 同前引，卷 44，咸平二年五月乙巳，頁 945。

¹⁵³ 程光裕，〈澶淵之盟與天書〉，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頁 119。

「今非太平耶？」王濟回答：「北有胡寇，西有賊遷，關右、兩河歲被侵擾，臣敢謂未也。」¹⁵⁴ 外患的侵擾使宋朝一點都不太平，這實際上是文武官員都心知肚明之事，只是在修德來遠、四夷置之度外的說法成為主流的情況下，過去文臣在說詞上，竟然很少拿外患來否定太平，否則等於間接認為皇帝無德。真宗面對王濟的否定，不但不發怒，反而為之「動容」，且「留之問以邊計」，反映了真宗面對現實的態度。

咸平四年七月，真宗再度收到契丹將入寇的情報，¹⁵⁵ 該年八月，真宗與宰相呂蒙正有這樣一段對話：

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時和年豐，即為上瑞。」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¹⁵⁶

呂蒙正曾在端拱年間與趙普一同在「端拱無為」的政策方針下入相，如今不知是不了解邊情已經緊急，或是刻意避重就輕，認為太平有「象」。真宗面對此恭維，並未顯出高興的神色，反而主動說出近邊之民仍受兵禍，自己將憑藉武力驅逐戎寇。咸平六年，契丹又南侵，真宗再度打算親征，只是未成行。¹⁵⁷ 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已大舉南侵，其間雙方邊打邊談，真宗了解契丹的目的是想要關南地，但他堅持太宗以來的一貫立場：可以給予財貨，但絕不能割讓土地，¹⁵⁸ 否則「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¹⁵⁹ 展現若要割地就不惜一戰的積極態度。至於景德元年，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坐鎮澶淵，擺出親征姿態，已是學界所共知。

相較於咸平年間文臣仍固守修德來遠之論，真宗應對契丹的方式已在實際作為上，也在言論上改變「四夷置之度外」的立場。可以想見，修德來遠的消極論調，在外患寇擾的局勢中，將成為積極應對的包袱。真宗既然否定自己有足夠的「德性」，自然無法談「來遠」，則唯一的對外方法就是以軍事實力對抗契丹。於是，

¹⁵⁴ 釋文瑩，《玉壺清話》，《全宋筆記》第1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4，頁121。

¹⁵⁵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9，咸平四年七月己卯，頁1066。

¹⁵⁶ 同前引，咸平四年八月壬子，頁1069。

¹⁵⁷ 同前引，卷55，咸平六年七月，頁1206。

¹⁵⁸ 蔣復璁，《宋真宗與澶淵之盟》，頁277。

¹⁵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景德元年閏九月，頁1269。

他與群臣認真討論軍備，訂定禦敵計畫，也在邊境大規模修建塘埭、訓練民兵。¹⁶⁰相較於太宗在端拱以後已不談親征，真宗則實際坐鎮前線、指揮軍事。而真宗這樣務實的態度，既是對太宗後期無法解決邊患的反省，也是在契丹加緊寇邊的局勢下，不得不有的轉變。總之，真宗雖繼承太宗後期的和平目標，但於達成和平的方法上已作出重大調整。不能忽略的是，若與太宗前期相較，太宗當時欲以武力奪取燕雲，此時真宗的積極對外，目標已降低為換取可接受（如不割關南地）的和平條件，使外敵「不敢侵擾」、近邊之民獲得安泰而已。

七、太平的到來與封禪

看似棘手萬分的西、北問題，在景德元年相繼消解。在對李繼遷方面，二月，與宋聯和的土蕃六谷族大首領潘羅支，用計詐降並大敗李繼遷，李繼遷中流矢，傷重身亡。在宋主動媾和下，與繼遷子德明訂立和約，景德二年（1005）九月，李德明開始遣使入貢，經過幾番交涉，李德明向宋稱臣，宋則封德明為西平王。¹⁶¹在契丹方面，景德戰役發生期間，宋遼一直邊打邊談，雙方都表現出議和的意願，¹⁶²最後，真宗在堅持不割讓關南地的前提下，終於以三十萬的歲幣簽定澶淵之盟。儘管相較於漢唐盛世，澶淵之盟的簽訂標示宋朝達到的和平成就遜色不少，既未能「統一」燕雲，亦未能壓制外敵。然而，和約畢竟保證了西、北的和平局勢，宋朝仍跨過了致太平最困難的一關。本文最後想要說明，景德年間（1004-1007）真宗君臣如何在傳統文化制約下，完成肯定太平到來的封禪典禮。

景德年間，真宗加意於內政上的治理，希望以太平之「術」感動上天，以求得太平之「象」。真宗在景德年間所施行的太平之政，不是本文所能一一列舉，此處僅舉出較重要的幾項。例如，依照傳統政治文化中對太平之「象」的看法，除了外夷不侵外，還要有境內豐收，景德年間，真宗即特別著意於此，比過去更加積極祈

¹⁶⁰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頁 71-190。

¹⁶¹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27-31。

¹⁶² 有論者認為契丹的議和企圖更甚於宋，參見蔣復璁，〈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頁 133；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頁 120。而王民信則針對契丹與宋何方主動談和此一問題，討論過去的各家說法，並認為宋先主動的可能性較大，參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食貨月刊》，5.3（臺北：1975），頁 97-108。

求豐收。¹⁶³ 景德三年（1006），真宗頒下自己還是太子時所聽聞的「畫龍祈雨法」，詔令中表明「宜頒字縣，以祐蒸黎，庶消旱暵之災。」¹⁶⁴ 該年有臣僚請建諸路常平倉，認為能夠「廣惠民、防備災沴」，真宗下詔三司集議後，批准了此奏。¹⁶⁵ 又如傳統政治思想一向認為刑獄有冤，將使上天降下災禍，因此太宗和真宗都非常重視刑獄。原本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由胥吏擔任，端拱年間，寇準奏用士人，太宗批准，此後可能並未嚴格施行，因此景德二年，真宗又重申此令，並增加了慎選法直官和任滿可授京官的規定。¹⁶⁶ 景德三年，又將原本不定期親自錄囚改為每年暑月皆錄問。¹⁶⁷ 而亦是在端拱年間設置的諸路提點刑獄司，於淳化四年因太宗認為績效不佳而罷，¹⁶⁸ 此後中央不時遣使錄囚，至真宗景德四年又復置提點刑獄，真宗表示：「勤恤民隱，遴揀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新任的提點刑獄官即由真宗親自面見、選授。¹⁶⁹ 這些政策的背後都隱藏著真宗內心的盼望，即上天會滿意自己的統治，降下象徵太平的豐收等祥瑞。

景德二年以後，豐收的消息年年傳來。¹⁷⁰ 對真宗君臣而言，這絕非僥倖，而是上天對趙宋的肯定。緊接著「太平」的呼聲應時而至。釋文瑩（生卒年不詳）的《玉壺清話》記載，景德三年出現「光芒如金圓」的巨星，春官正周克明（生卒年不詳）聲稱是「周伯星」，並認為其「所見之國，太平而昌。」¹⁷¹ 而文瑩也肯定

¹⁶³ 據學者統計，真宗是宋代皇帝中，外出祈雨次數最多的，見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74。

¹⁶⁴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卷151，〈頒畫龍祈雨法詔〉，頁563。

¹⁶⁵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六·司農寺〉，景德三年正月，頁1。

¹⁶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0，景德二年六月己卯，頁1344。

¹⁶⁷ 同前引，卷62，景德三年四月，頁1395。

¹⁶⁸ 同前引，卷34，淳化四年十月，頁754。

¹⁶⁹ 同前引，卷66，景德四年七月，頁1477。

¹⁷⁰ 同前引，卷61，景德二年十一月，頁1374；卷64，景德三年九月庚戌，頁1425；卷66，景德四年八月，頁1487。

¹⁷¹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1，頁89-90。「周伯星」在歷史上出現的次數並不算多，但在《晉書》已提及：「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2，〈天文中·瑞星〉，頁323。有趣的是，景德三年三月，即此周伯星出現前不久，出現「熒惑守心」的天象，而熒惑守心一向被認為是最凶的天象，參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中國星占學上最凶的天象“熒惑守心”〉，頁23-48。但此次「熒惑守心」似乎被真宗君臣（刻意）忽略，並未引起任何波瀾。

這時「朝野多歡，六合平定」，「周伯星」出現得正是時候。¹⁷² 九月，真宗與宰輔有這樣一段對話：

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己為民，遠裔懷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又州郡守臣，尤須選擇，近日亦頗有公勤幹事者，多以細故與僚屬不和，因之害政，況凡近無識，好居人上者，安能每事循理哉？」¹⁷³

若理解太平與封禪的文化聯結，便可知真宗「封疆寧謐，氣序均調」的話，正是在暗示太平已致，王旦當然心領神會，他指現在「遠裔懷徠，歲豐人樂」實是對真宗話語的復述，並點出這是「太平」的景象。一聽到「太平」，輔臣們立刻敏感地再次恭賀真宗，真宗雖謙虛的表示「亦卿等之功也」，事實上正是肯定太平已經到來。¹⁷⁴ 不過，真宗了解太平的景象須以太平之術來維繫，因此他緊接著表示要謹守經制、慎選地方官。王旦「遠裔懷徠」之語，正是「修德來遠」的換句話說；景德四年，當簽書樞密院事馬知節宣稱「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真宗已經不表示異議。¹⁷⁵ 本文開頭所引大中祥符元年的君臣對話，真宗更委婉表示自己亦是有德之君。可見此時臣僚主張真宗之德可以來遠，已得真宗接受。

「太平」既已獲得真宗君臣的承認，可以想見，「封禪」的念頭已在他們心中萌發。既然外無戰事且境內豐收，唯一所欠便是祥瑞。而不同的珍禽異獸是否算是祥瑞，本就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要得祥瑞反而並非難事。考真宗對祥瑞的態度，亦與太宗相呼應。曾獻上「玄兔」給父皇的真宗，在即位後不久，向大臣表達自己對祥瑞的看法：「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

¹⁷² 張知白上疏論此事，認為過去君王的八項缺失「陛下悉皆無有，固已超絕於百代矣。誠能日新其德，雖休不休，則瑞星不出，臣亦賀鴻祚愈隆，而青史增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3，景德三年六月丁丑，頁 1405。

¹⁷³ 同前引，卷 64，景德三年九月，頁 1426。

¹⁷⁴ 景德四年九月，真宗便以「承平既久」為理由，下令文武臣僚的俸祿「並給實錢，在京六分，在外四分。」同前引，卷 66，景德四年九月，頁 1487。

¹⁷⁵ 同前引，卷 67，景德四年十一月，頁 1506-1507。

當」，下詔不准再獻上。¹⁷⁶ 咸平年間，諸州有獻祥瑞者，真宗都下令退還。¹⁷⁷ 然而，景德以後，真宗改變了對祥瑞的態度。景德三年，真宗學習太宗，親撰「《祥麟》、《丹鳳》、《河清》等十三曲」；¹⁷⁸ 景德四年，禮部以「福應之至，以顯盛猷」為理由，請求將各地有關祥瑞的消息上報禮部，並交付史館記錄，真宗表示同意。封禪的前一個月，有「雙鶴」飛過運送天書的車，丁謂（966-1037）稱雙鶴「飛舞良久」。¹⁷⁹ 而「天書」的降臨，自然也是一種瑞象。¹⁸⁰ 而真宗對祥瑞的態度也從過去的排拒轉為接受。¹⁸¹

如此一來，封禪的條件可說是一一具備，四方請願的戲碼終於可以上演。真宗在封禪前的御製序銘慎重提及太宗欲封禪而未成之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增高之文，已頒乎成命。逡巡其事，謙莫大焉。肆予冲人，獲守丕構，……濟河耆老，鄒魯諸生，啟予以神休，邀予以封祀。¹⁸²

引文呼應了本文一開頭提及真宗繼承父志的表述。接著觀察真宗答應封禪的過程，

¹⁷⁶ 同前引，卷 40，至道三年六月，頁 867。

¹⁷⁷ 同前引，卷 50，咸平四年十一月壬申，頁 1082；卷 67，咸平五年十月丙子，頁 1156。

¹⁷⁸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五六·朝會〉，頁 6。

¹⁷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頁 1560-1561。此時天也出現吉祥星兆，相對於「五星會聚」往往象徵有明主出世，景德四年卻是出現象徵「臣讓明於君」的「五星皆伏」，參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中國星占學上最吉的天象——「五星會聚」〉，頁 49-72。

¹⁸⁰ 相較於動物、植物類祥瑞，「天書」是上天直接用文字肯定真宗具有封禪資格。可看景德四年十一月，真宗與王欽若的對話：欽若曰：「……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7，景德四年十一月，頁 1560。所謂「河圖、洛書」即為天書，被王欽若視為「天瑞」。事實上，天書也是與封禪相關的文化傳統。《太平御覽》〈禮儀十五·封禪〉第一段就引《禮記》管仲語：「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李昉等編，夏竦等點校，《太平御覽》，卷 536，〈禮儀十五·封禪〉，頁 244。到底王欽若等「五鬼」，在真宗的東封西祀上扮演何種角色？筆者認為，恐怕不是造成封禪典禮的舉行，而是形塑封禪進行的模式，與之後一連串神道設教活動的進行。針對此，筆者將另文討論。

¹⁸¹ 這從本文一開頭引真宗召王旦觀看四百種瑞物亦可說明。真宗大中祥符時代（1008-1016），祥瑞更加頻繁出現，史稱「群臣數奏祥瑞」。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頁 1702。

¹⁸² 查志隆撰，湯貴仁點校，《岱史》，《泰山文獻集成》第 2 卷（濟南：泰山出版社，2005），卷 6，〈狩典紀附封禪·真宗御製序銘〉，頁 55。

可發覺他一方面對太宗的過往經驗加以仿效，同時也表現出更高度的謙讓姿態。首先，景德四年底，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真宗並未答應；¹⁸³ 這就如同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請東封，太宗亦未答應。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兗州父老呂良等一千多人來京請封禪，呂良等人「說服」真宗行封禪大禮的理由便是「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真宗「照例」表示猶豫，於是呂良等人說：「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答靈貺，早行盛禮。」即是指外安內富，正顯示「太平」之象，但真宗依然謙讓不允。¹⁸⁴ 於是，請求封禪的人士層級不斷升高，先是諸道八百多位貢舉人請封禪，隨後，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等兩萬多人，五次上表請封禪，於是，真宗終於以比他父親更「勉強」的姿態答應了。可以想見，真宗身為繼體之君，在封禪請願的「形式」上須對太宗過往的經驗顯露謙遜，這一方面解釋了真宗為何讓群臣五次上表（雍熙時候三次）；可能也部分解釋了真宗為何在大中祥符元年進行封禪，這時真宗已即位十二年，太宗於雍熙元年時即位十年，他很「謙卑」地晚了父皇二年。封禪完成後，真宗將泰山頂改名「太平頂」，¹⁸⁵ 這可說是對自己政治成就的肯定，「致太平以封禪」至此似乎大功告成。

八、結論

以「致太平以封禪」觀察北宋前期政治，既是從較長遠的角度理解宋真宗為何舉行封禪，更是探討趙宋君臣如何面對最重要的政治課題——走出五代，並藉此了解當時的政治文化與君臣心靈。我們看到，宋真宗得行封禪的背後，是多條脈絡的交織：傳統政治文化中，太平與封禪概念上的聯結，為太宗、真宗君臣提供行動資源，「太平」成為政治目標，封禪則用來肯定此目標的達成；然而，始終未能自信已致太平的太宗君臣，種種曲折婉轉的自我肯定話語，恰好暴露對政權的不安全感時時刻刻籠罩著他們；文臣們修德來遠思想的提供，則為軍事力量不足卻仍想太平的太宗提供了解套辦法，這在激勵太宗更著力於內政經營的同時，也為文臣創造了議論朝政的政治空間；當致太平成為真宗繼承先志的重責大任，真宗的務實態度，使他藉由強調自己無德，以開拓積極對外的空間。這些力量的激盪與互動，最終才有真宗君臣對太平已致的肯定；而大中祥符的封禪典禮，正象徵趙宋完成了最重要

¹⁸³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頁 1506。

¹⁸⁴ 同前引，卷 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甲戌，頁 1528-1529。

¹⁸⁵ 查志隆撰，湯貴仁點校，《岱史》，卷 6，〈狩典紀附封禪·宋真宗〉，頁 54。

的時代任務。

然而，趙宋的太平成就卻依然不能不愧於前代，相較於漢唐曾封禪的君王對外敵的壓制，趙宋取得的統一程度與和平地位都稱不上光榮，使他們的太平存在瑕疵。這或許解釋了為何真宗封禪，需有天書三番兩次的加持，及往後西祀汾陰、聖祖降神等一連串神道設教的節目。真宗可說是藉神力來加強太平盛世的形象。不過，這些神道設教的活動，為何以頗具道教色彩的方式展開？是王欽若個人的安排，或是有某個文化集團在背後推動與策劃？而這些策略與方法，又是否真的幫助趙宋君臣獲得令人滿意的統治信心？這並非本文能夠解答，必須留待他日另撰一文了。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田 錫，《咸平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2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朱 弁，《曲洧舊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朱 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第 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李 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 李 昉等編，夏劍欽等點校，《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李 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杜 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宋敏求撰，誠剛點校，《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宋 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查志隆撰，湯貴仁點校，《岱史》，《泰山文獻集成》第 2 卷，濟南：泰山出版社，2005。
-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收入趙鐵寒編，《宋史資料萃編》第 1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徐 松輯，陳援庵等編，《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
- 徐 鉉，《徐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班 固，《白虎通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脫 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劉 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劉 炫，《春秋左傳述義》，收入王謨輯，《漢魏遺書鈔》第 3 集，《經翼四集》，板橋：藝文印書館，1970，嘉慶三年刻本。
- 錢若水等，《宋太宗實錄》，收入繆荃孫編，《古學彙刊》第 1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魏 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釋文瑩，《玉壺清話》，《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二、近人論著

- 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食貨月刊》，5.3，臺北：1975，頁 97-108。
- 王曉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的對遼策略〉，《四川大學學報》，4，成都：2000，頁 100-106。
-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朱文鑫，《天文考古錄》，長沙：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李華瑞，《宋史論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 _____，《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汪 海，《漢唐封禪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23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71-190。
-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審判職能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第 6 版。
- 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5。
- * 梁庚堯，〈從「修德來遠」看曾國藩對外交內政的態度〉，《史繹》，9，臺北：1972，頁 20-24。
- * 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9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7，頁 63-97。
-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陳遵媯，《中國天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84。
- * 張其凡，〈雍熙北征到澶淵之盟〉，《史學月刊》，1，開封：1988，頁 25-30。
- _____，《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張家鳳、黃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清華學報》，20.2，新竹：1990，頁 361-378。

- 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 程光裕，〈澶淵之盟與天書〉，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頁 119-134。
- * 傅 揚，《從喪亂到太平——隋朝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 *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 * 蔣復璁，《宋史新探》，臺北：正中書局，1966。
- _____，〈宋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考〉，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頁 167-170。
- _____，〈宋真宗與澶淵之盟〉，收入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頁 270-287。
-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
- Fang, Cheng-hua. "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5, 2005, pp. 55-84.
- * _____.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Fang-ming. "Songchu Mibing Lun de Jiantao (A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 of Cease-Fire in Early Song)," in Song History Forum (ed.), *Songshi Yanjiu Ji (Anthologies of Song History Studies)*, vol. 9.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7, pp. 63-97.
- Fang, Cheng-hua.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 Fu, Yang. "Cong Sangluan Dao Taiping: Suichao de Lishi Jiye yu Yishi Xingtai (From Death and Disorder to Great Peace: Historical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under Sui Dynasty),"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1.
- Jiang, Fu-cong. *Songshi Xintan (A New Study on Song History)*.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1966.
- Li, Hua-rui. *Songxia Guanxi Shi (History of Relation between Song and Xia Dynastie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iang, Geng-yao. "Cong Xiude Laiyuan Kan Zeng Guofang dui Waijiao Neizheng de Taidu (Zeng Guo-fan's Attitude Toward the Diplomacy and Domestic Affairs in 'Be Moral to Beckon Foreigners')," *Shiyi*, 9, 1972, pp. 20-24.
- Liu, Jing-zhen. *Beisong Qianqi Huangdi han Tamen de Quanli (The Emperors and Their Power in Early Song)*. Taipei: Daw Shiang Publishing, 1996.
- Liu, Li-yan. "Songliao Chanyuan zhi Meng Xintan (A New Study of Chanyuan Treaty of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in Song History Forum (ed.), *Songshi Yanjiu Ji (Anthologies of Song History Studies)*, vol. 23.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5, pp. 71-190.
- Zhang, Qi-fan. "Yongxi Beizheng Dao Chanyuan zhi Meng (Yongxi War and Chanyuan Treaty)," *Shixue Yue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1, 1998, pp. 25-30.

**To Achieve Great Peace:
Song Taizong to Zhenzong's "Fengshan" Activities**

Chang, Wei-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98123001@nt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early Song 宋 era by analyzing the *fengshan* 封禪-related activities of Song Taizong 宋太宗 and Song Zhenzong 宋真宗.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fengsha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dea of Great Peace 太平. There were four conditions that had to be fulfilled to achieve Great Peace: unity, lack of foreign invasions, lack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auspicious signs from heaven. I go a step further and discuss how Taizong and Zhenzong regarded the dynasty's distance from Great Peace, and also which methods they used to try to achieve it. Taizong tried many times to perform *fengshan*, but he had to give up because he could not satisfy the conditions for peace. Zhenzong, on the other hand, claimed the achievement of Great Peace, for he had broken away from the shadow of a short-lived dynasty.

Key words: Song Taizong, Song Zhenzong, Great Peace, *fengshan*

(收稿日期：2012. 6. 5；修正稿日期：2012. 10. 8；通過刊登日期：2012. 11. 21)